太陽花學運對大學生的藍綠支持之影響探討

紀伯穎

中正大學政治學系研究所碩士生

**摘 要**

2014年的太陽花學運為台灣社會重大事件，對後續台灣與兩岸關係的影響甚大。作者利用二元勝算分析探討在太陽花學運中那些大學生的政治態度、資源、政治社會化過程會影響其參與可能，並進一步分析太陽花學運對大學生的政黨偏好。結果指出支持泛綠、社會階層較高、距離較近、觀看媒體種類較多、與同儕政治態度相似的男性更可能參與太陽花學運；而參加或是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大學生則較可能支持泛綠，不支持太陽花學運、觀看媒體種類較多、女性較可能支持泛藍。整體而言，事件會對政治態度產生影響。

關鍵詞：太陽花學運、政治社會化、關鍵事件、政黨偏好

壹、前言

2014年3月18日，在立法委員張慶忠宣布將服貿協議送院會備查時，立法院外的學生與群眾抗議加劇，最後在晚間衝進立法院，佔領議場。在23天後，4月10日時任立法院長王金平宣布：「先立法，再協商。」後撤出立法院。此次運動被稱為太陽花學運，不僅在當時成功阻擋《海峽兩岸服務貿易協議》的通過，也被認為是影響後續台灣與兩岸關係的的重大事件。

縱觀國內外，以學生為首的政治抗議事件並不少見，從1968年美國的哥倫比亞學生示威、法國的五月風暴、到台灣早期的野百合學運與前述的太陽花學運，皆可看到由學生們所帶領的抗議活動，不過像這樣的突發政治事件對於人們在政治意向上的改變通常較難被研究，因其較正常的政治運作或選舉活動更加難以預測且多無法事前準備與搜集相關資料加以比對，故相關的研究也較少。即便有對事件的研究，多半也由事後的訪談或是文本分析為多數，如Doug McAdam所撰寫的《自由之夏》即是一例。除上述之外，利用事件發生前後對比的研究尚為少數，雖事後的訪談與與文本分析皆是種對抗議事件分析良好的方式，但若要研究人們因事件而產生的態度變化，長期的定群化追蹤會比研究一個時間斷點更容易看出差異，故本研究希望近一步以定群化追蹤的方式探討事件對於人們態度的影響。

本研究主要是分析台灣大學生對太陽花學運的想法與藍綠之間的關係，不同於由事後的調查研究或是文本分析，筆者利用定群追蹤調查進一步評估太陽花學運影響的可能，從而比較該群體在事件前後的態度。另筆者研究的族群比較特殊，為2011年入學之大學生，大學生作為教育階段的中後端，不論在年齡或是學習歷程都屬於較容易改變個人的政治傾向階段，除此之外，大學生亦在學生運動中扮演重要角色，故筆者認為有分析之必要。所以本研究藉由是否有參與太陽花學運以及對太陽花學運的態度兩部分來觀察對同一群大學生在大學時期政黨偏好的影響。

需要說明的部分是，作者本篇使用政黨偏好而非政黨認同，將國民黨、親民黨分為「泛藍」，將民進黨、台聯黨分為「泛綠」，將沒有特定政黨認同者分為「中立」，原因如下：

第一，以往文獻中提到關於政黨認同多指選民對於單一政黨的情感認同，但實際上部分選民的政黨認同可能會在不同選舉會有不同的政黨認同，甚至會同時具有兩種以上的政黨認同(Converse,1996;引自游清鑫，2002)。Weisberg(1980;引自游清鑫，2002)認為多重政黨認同是有存在的可能性，而非只對單一政黨有著情感的認同。故筆者認為用單一的政黨認同分析恐對尚在民主化的台灣選民不甚理想。

第二，在2000年的總統選舉之後，國民黨認同的比例被親民黨瓜分，爾後親民黨皆能在立法院獲得席次，在歷次的選舉中，亦有台聯、時代力量等政黨分別獲得席次，整體而言，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尚未穩定，且進入國會的政黨不斷改變，除過去長期執政的國民黨外很難產生穩定的政黨認同，反而是在「泛藍」或「泛綠」的偏好中遊走。

第三，國內政治學者亦不乏使用「泛藍」和「泛綠」作為分析的變項。例如游清鑫(2004)曾使用「泛藍」和「泛綠」探討分裂投票的行為、劉嘉薇、黃紀(2012)利用「泛藍」和「泛綠」研究父母親對大學生的政黨偏好影響、陳光輝(2018)研究政治學相關科系大學生時，亦分析參與太陽花學運與「泛藍」、「泛綠」和「中立」等政黨偏好之間的關係，故本研究欲使用相同的分析方式進一步與過去的研究對話，試圖為過去的研究拼湊出更完整的脈絡。在文獻檢閱對於政黨認同的部分為尊重原文，故還是援用政黨認同的概念，而筆者欲研究的部分則以政黨偏好稱之，以便區隔。

貳、文獻檢閱

本研究主要著重重大事件對於行為者的政黨偏好影響，先討論政黨偏好的可能成因與影響，再由政治社會化的歷程切入，討論大學生所受到的影響，其後進一步分析大學生在高等教育的階段，哪些因素會讓他們參與抗議事件，這些抗議事件又對大學生有什麼影響，並建構出理論和研究目的。

一、台灣公民的政黨偏好

政黨認同是人們對於政黨的心理認同，代表了選民對於該政黨的情感累積所形成的長期支持，而非在選舉時期對單一候選人的支持而已(Campbell et al., 1960)。陳陸輝(2000)整理了三個政黨認同的特性，分別為穩定度高、形成於生命週期的早期、產生政黨認同後會隨著生命週期增加其強度(Campbell et al., 1960)。政黨認同的持續亦不需要靠法律、是否為黨員以及過去是否持續支持該政黨來認定(Campbell et al., 1960)。Niemi and Weisberg(1993:210;引自黃紀、劉嘉薇，2012)也提到：「政黨認同的重要性除了對選民投票行為的直接影響，還包括對其他決定投票行為重要因素的影響。」可見其在政治研究中佔有一席之地。

在美國，政黨認同的觀念普遍且穩定的存在多數的選民中。然而這個觀念雖在美國的研究多有建樹，且也是美國在解釋投票行為與政治態度上非常重要的觀念之一，但同樣的觀念是否可以用在美國以外的國家？許多研究提出了不一樣的觀點，主要提出的問題為語言和文化差異是否能被克服(Converse and Pierce, 1985；Dalton, 1998；Kaase, 1976；引自陳陸輝，2000)。

而在台灣，政黨認同的觀念是否可以與美國類比？政治學界提出了許多不同的觀點，陳陸輝(2000)研究台灣選民的政黨認同中發現，台灣選民對國民黨已經形成了穩定的政黨認同，但因為持續在經歷政黨重組的過程，使得台灣政治民主化仍處在動態的變化。游清鑫(2002)則發現表較多數的民眾偏好的政黨強度偏小或是沒有特定的政黨偏好。而後亦有學者使用「藍綠」作為政黨偏好取代政黨認同，分析台灣選民的政治行為。如前述的劉嘉薇、黃紀(2012)的父母政黨認同對大學生的影響，陳光輝(2018)太陽花學運對大學生的政治社會化等，皆與原本的政黨認同概念類似但並非完全相同。故筆者認為台灣雖可以借鏡政黨認同這一個概念，但考慮到國內政黨推陳出新、選民較多沒有特定政黨偏好等原因，可以用「泛藍」和「泛綠」替代原本的政黨認同，直至選民發展出穩定的政黨認同為止。

二、政治社會化對大學生的影響

人們的政治態度、政黨認同或偏好、政治效能感等對政治社會的判斷與想法，都與政治社會化相關。然而何謂政治社會化？最初的概念是由社會心理學家H. H. Hyman提出，他指政治社會化指的是行為人透過社會中各種方式去學習符合其社會地位行為模式的整個過程(Hyman,1959)。一個大學生在形塑個人意識形態與想法時，分別會受到家庭、教育、同儕、大眾傳播媒體、個人的生命歷程、該世代的特質、以及關鍵事件的影響，以下會依序說明。

(一)家庭

家庭作為一個人最一開始的政治社會化歷程，不僅只是在社經地位與社會階層中影響甚深，對於一個二十歲左右的青年來說，甚至是他花費最多時間的生活場所，可見其重要性。Jennings, M. Kent 和 Richard G. Niemi (1971)檢視了父母在政治社會化所扮演的角色，其中提到多數的美國人在其小時候已開始學習父母親的政黨認同。劉嘉薇、黃紀(2012)更檢視了台灣父母對大學生的政黨偏好影響，發現不論進入大學的時間長短，家庭對大學生的影響力持續且不會削減，且父母與子女的政黨偏好相同的可能性極高。

(二)教育

教育在政治社會化中扮演著重要的角色，除了既定的課程提供政治社會化的學習，亦會藉由老師與學生的互動，傳達更深層的政治價值與想法，Almond和Verba(1963) 在《The Civic Culture》一書中曾比較了美國、英國、德國、義大利以及墨西哥的人民，提出公民透過學校的教育學習政治知識以及政治參與，而學校也是一個公民早期接觸到權威關係的場域。

教育對大學生也有舉足輕重的影響， Dawson 和Prewitt(1969)就提出一個人對政治世界的想像與理解取決於他的教育程度，且教育程度越高的人通常會有更高的政治校能感、更多對社會的責任感、更在意政治以及更多的政治參與。大學教育做為整個教育過程中的後段，勢必對於一個公民的認知有更深一層的教育意義，陳光輝(2019)也提及大學為生命過程中非常重要的階段 ，因為該年紀也是正式進入政治世界並取得公民權的時刻。

而大學教育對公民到底有何影響？Jennings 和Niemi(1982,257-60)研究發現大學教育會使學生意見轉向較偏自由主義，不過Highton(2009)對另一群大學生進行定群分析後表示有些意見的改變並不是大學教育產生的，而是早在其高中時就有所轉變，但其後Erikson和 Tedin(2015)比較了2004年進入美國大學的學生與2008年畢業時的態度發現，不管意識形態偏左或偏右的學生，在大四畢業時都有向左傾的趨勢，且更支持同性婚姻、墮胎合法化、廢止死刑等議題。綜上所述，大學教育會對一個人的意識形態造成影響，且此影響並不只針對特定意識形態的學生，且大學的教育通常被認為會對大學生的自由主義產生正面的影響(Jennings and Niemi,1982;Hastie, 2007; Chatard and Selimbegovic, 2007)。

(三)同儕團體

同儕之間的關係對彼此的影響甚大，因同儕間年齡接近，且多為興趣類似、有共同話題與希望獲得認同才會齊聚。Dawson和Prewitt(1969)即提到同儕團體是一種公民的社會化與調整的途徑之一，David Riesman(1950)進一步提出同儕團體會替代父母成為最重要的社會化途徑，Sebert, Jennings, and Niemi (1974)的研究也做出同儕團體之間的影響對18歲的公民來說比父母影響更大。不過也有其他研究持相反立場，Tedin (1980，136-54)研究美國公民後發現在特定議題如種族融合、對中政策等家庭因素都大於同儕之間的關係。

(四)大眾傳播媒體

大眾傳播媒體為公民日常獲取政治資訊的重要管道，其在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可見一斑。Bardes 和Oldendick (2000,pp. 92-96)提出以下幾項關於大眾傳播媒體如何進行閱聽人的政治社會化，包括提供資訊、設定議題框架、傳達訊息，而上述三項功能若存在偏誤則會產生資訊不對等的偏見。但Hyman(1963, pp. 143)卻認為雖大眾媒體會在現代社會對閱聽人產生影響，但其潛在的影響力恐被高估。上述立論的進一步發展即是「最小影響模型」，最初由Lazarsfeld, Berelson, and Gaudet (1948); Berelson, Lazarsfeld, and McPhee (1954)的定群分析提出，其定義為雖然閱聽人透過媒體接受訊息，但還是必須透過閱聽人自身的意識形態消化後才會產生個人的意見，而閱聽人在接受訊息後最終還是會回到其原本持有的意見與態度，故大眾傳播媒體實際上不會對閱聽人產生重大的影響。不過Erikson和 Tedin (2015) 認為雖有「最小影響模型」的存在，但實際上大眾媒體的影響會比「最小影響模型」再多一些。筆者認為大眾傳播媒體作為資訊的傳播者，對於閱聽人的政治社會化還是有一定的影響。

(五)生命歷程

一個人一生的每個階段本身即是政治社會化的過程，隨著個人的年齡增長，在面對生命歷程的每一個階段，如工作、結婚等過程致使本身產生政治態度的改變。Anja和Niemi (2014)指出年齡的效應是指隨著公民的年齡與社會經驗的積累而產生整個生命週期的變化，而不同時段的社會、政治、經濟等狀況即會影響所有年齡的公民。但同年齡的公民可能會因為其信仰系統的不同而產生相異的社會化經歷，進而有不同的政治態度。

(六)世代

身處於同一世代的人，因其共同經歷相同的成長環境、教育、以及歷史事件，故會有相同的政治態度，相對於生命歷程主要是影響政黨傾向的強弱，世代的影響較著重於對公民的政黨傾向本身(Erikson, Tedin, 2015)。

(七)關鍵事件

關鍵事件雖非常態性的發生，但在事件發生的當下到結束，甚至公民的一生皆有可能會受其影響而產生程度不一的態度改變，自由之夏一書對此有個很好的詮釋。Doug McAdam：「自由之夏給予了參與者一個全新的生活方式，跨種族的人際交往、共同居住的生活、新的政治意識形態以及批判政府的新觀點，其對這些年輕人的影響持續而未消逝。」

為進一步了解事件對於人們政治態度的影響，Raviv, Sadeh, Raviv, Silberstein,and Diver(2000)分析以色列年輕人對恐攻與總理被暗殺兩件事情的反應，進一步應證三種情緒反應，分別為態度轉變，原本對於總理所推行的政策持反對意見的受訪者變為支持；悲傷情緒的消退，經過比對事件當下與五個月後對該事件的態度，得以發現受訪者的情緒逐漸平緩，不在像之前一樣憤慨，連帶著對政策的態度也有轉變；以及對不同的創傷反應，面對總理被刺的消息，該政黨的支持者情緒與政治態度轉變明顯強於反對黨的支持者，但在面對恐攻事件時，不論哪一個政黨的支持者情緒並沒有如此大的差異。這顯示事件對人的影響會因時間而趨於平緩，且會在發生當下使得人的態度有所轉變，但根據不同的事件對於公民本身的影響很大部分取決於它自身的立場，而非事情本身。

而年輕人對於事件的感受又較其他時期更為敏感且影響更深遠，Elias(2013)分析了年輕人在美國水門案後對政治態度的影響，發現年輕族群較年長族群在水門案後對於尼克森的看法更加負面，且不論是對於尼克森的信任度、支持度與是否會做好總統的回應皆比較年長族群低。

三、大學生與抗議事件的關係

延續前述政治社會化的影響，得以發現大學生為一個相當特別的族群，不僅在年齡處於態度較易改變的時期、本身尚未完全脫離來自家庭的影響、且又受到高等教育的薰陶，可說是政治態度發展相當關鍵的時期。而且相較於其他青年，受大學教育的青年人在未來成為政治菁英的可能性較高，又該族群對政治的態度與價值對未來的政治面貌有很高程度的影響(陳光輝，2018)。接下來，我們會檢視相關文獻，進一步探討抗議事件中參與者的動機與受到的影響。

(一)參與者的動機

誰會參與抗議事件?一般而言，常規的政治活動通常都是社經地位較高者的參與程度較高，但相較前者，參與抗議活動這種非常規性的政治活動，與社經地位較無關係，主要還是以資源、意願和是否被動員為影響人們參與抗議事件的動機(Verba, Schlozman, and Brady,1995)。

而過去的研究中發現，政黨傾向、自由與保守的意識形態為影響人們是否會參加抗議行動的重要因素，Jennings(1987)比較了美國在針對反越戰的抗議參與者與沒有參與抗議者之間的差異發現，相對於沒有參與者，參與抗議的人的政黨傾向較多支持民主黨，且意識形態光譜上較偏自由主義，較支持政府提供社會福利，對軍隊與警察的支持度也低於沒有參與的人。Pierce和Converse (1989)在研究法國的五月運動時亦發現法國民眾對於參加遊行與罷工行動與否皆受到意識形態的影響。

政治社會化的各種方式也在此扮演重要的角色，同儕團體若多持正面態度，也會使個人更有意願參與抗議事件(Klandermans,1984)；社群媒體也被認為是突尼西亞的茉莉花革命終能成功動員群眾的重要因素(陳光輝，2018)。

性別也是參與抗議事件與否的因素之一，楊婉瑩和劉嘉薇(2009)提到女性遠離戰爭與衝突是一種普遍的現象，在台灣的研究亦發現女性較男性在兩岸的武力威脅議題較消極，但在和平協定則較支持。陳光輝(2018)則提到女性因環境因素而在參與抗議事件上受較大的限制。

綜上所述，影響參與者的動機會有他個人的資源、政治態度、政治社會化與性別等影響。

(二)參與抗議事件的影響

參與抗議事件對於人的影響亦屬於政治社會化中事件對於人的影響之一。延續前面所述，雖然參與抗議者可能在參加前就已經可能會有差異，我們亦可以將事件的影響力進一步分成原有態度的維持、強化、或是轉向(陳光輝，2018)。

Jennings(1987, 2002；轉引自陳光輝，2018)對1960 年代末期就讀大學的受訪者做長期的追蹤，檢視反越戰抗議活動的參與與否在不同生命周期的政治態度是否有影響。總的來說，早在大學與反越戰抗議事件開始前，參與者與非參與者的政治態度已經有差異。不過在抗議事件過後，上述兩者在政黨認同、政治人物評價、政治議題、意識形態上有更明顯的差異。雖然這樣的差異隨著不同生命階段而縮減，但還是會對參與者產生長期性的影響。

故本研究試圖藉由分析參與者的動機與參與抗議事件的影響兩方面來檢視太陽花學運對於大學生藍綠支持的影響。

參、研究問題、假設、資料來源與限制

一、研究問題與假設

本研究主要想要了解兩個問題，第一個為哪些因素會與大學生參加太陽花學運有關？根據前面的討論可以得出大學生所具有的政治態度、資源、政治社會化與性別等因素影響。

政治態度部分，太陽花學運最主要涉及的議題為立法院內兩岸服貿協議的簽署過程問題，因為其為台灣與中國大陸簽屬的協議，牽涉到選民在台灣人/中國人認同上的差異，也會影響選民對於藍綠政黨的偏好，進一步影響參與意願，故本研究假設對台灣人/中國人認同和泛藍或泛綠政黨的支持會影響其參加太陽花學運的意願。

資源部分，在參與成本較低或本身能力較足的情況下，民眾參與抗議事件的意願會提升，太陽花學運在立法院發生，故台北地區的大學學生的時間與金錢成本較低，非台北地區的大學生需要付出更高的代價才能參與。另外如果其社會階層較高，會更有能力負擔參與抗議事件的所產生的成本。

政治社會化部分，若周遭有著較多的政治資訊應該會對參與抗議事件產生正面的效果，大學生接觸大眾媒體的種類多較為單一，因此使用大眾傳播媒體的種類多寡會對大學生在獲取政治資訊上有一定影響，故本研究認為使用較多大眾傳播媒體種類的大學生會增加其參與的意願。另外在大學階段，個人的態度若與同儕之間相近，相互產生的鼓勵與認同作用會增加或減少參與抗議事件的意願，所以本研究假設越常接受同儕政治相關言論的情況越有可能產生這種認同，進一步影響個人是否參與。

最後，性別部分，我們假定女性因參與抗議事件的環境、較支持反對衝突等因素影響，參與抗議事件意願較低。

第二個欲解決的問題則是參與或支持太陽花學運會不會進一步影響個人的政黨偏好?根據上述事件對對人們的政治社會化看來，參與抗議事件的確會對人的政黨偏好有效果，而太陽花學運其實不只有單純的抗議，現場更舉辦多場演講與討論，致使參與者獲得大量的政治資訊，故筆者認為會比單純的接受到特定事件的影響更為重大。又此次抗議事件與政黨政治產生的問題有極大的關係，因此筆者認為參與者與未參與者以及支持太陽花學運與否都會對政黨偏好產生影響。

二、資料來源

本研究是使用針對2011年9月入學的全台灣大學生的追蹤調查資料，資料來源為陳陸輝主持的國科會計畫「我國大學生政治社會化的定群追蹤研究」。調查資料分別從該年大一入學的學生約209,703人追蹤至大四，以台灣四年制大學(扣除軍警校)約148所為基礎，各個學校為分層單位，將全台分為公私立、一般大學、技職院校以及師範大學等五個層級並抽出學校。爾後再以學校的大小與抽出單位機率等比例的原則抽出各校欲完成訪問樣本數共1,754份。其優點在於可以透過定群追蹤來觀看一定時間內大學生的變化。該筆資料在2011年進行時共完成1,754份，而待學生大四時回填1094份，本研究為分析兩個時段大學生的變化，將其合併後可分析之資料為1094份。

三、研究限制

本研究使用的資料是2011年入學之大學生的定群分析，主要是基於太陽花學運的參與者半數左右為大學生，但正在受高等教育的大學生為台灣社會獨特的一群人，所作之分析也只適用於該世代的大學生，無法推估至台灣全體民眾，為本研究無法精進之事，惟重大事件與人們政黨偏好、意識形態等觀念多有關連，台灣政治學界又少有定群分析可供分析探討，後續發展可期，本研究未盡之事，期待未來研究的發展。

肆、資料分析

本研究利用二元勝算分析模型來探討太陽花學運與政黨偏好之間的關係，資料分析分為兩部分呈現，第一部分主要檢視那些因素影響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接著，我們進一步分析太陽花學運參與和支持與否對政黨偏好的影響。

一、參與太陽花學運與否之因素

二元勝算分析結果如表一，列表左側為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的模型，右側為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分析。在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的部分，支持泛綠、社會階層、學校位置、媒體、同儕關係、性別皆呈現顯著相關。

在政治態度方面，可以看出支持泛綠的大學生相較於沒有政黨偏好的大學生更可能參與太陽花學運，然而泛藍卻沒有顯著相關。不過在是否支持方面，政黨偏好卻有明顯的影響，支持泛藍的大學生較不支持太陽花學運，支持泛綠的大學生則剛好相反，這也是合理的預期結果，因為太陽花學運的其中一個主要訴求即為抗議立法院由國民黨召委快速通過兩岸服貿協定備查一事，且泛綠政黨在太陽花學運中表態支持，大學生的政黨偏好也因此與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有關。無獨有偶，台灣人/中國人的認同在參與上並未呈現顯著相關，但在支持於否也有顯著相關，也在預期之中，支持與否本就與參與之間不一定是相等的關係，也需考慮個人實際的限制。

在資源部分，學校地理位置遠近與社會階層高低皆和是否參與有顯著相關，卻和支持與否沒有關係，這與陳光輝(2018)所做的政治學相關科系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追蹤分析有類似的結果，說明了參與學運的這個動作的確與所擁有的資源以及花費成本有關。

在政治社會化部分，觀看媒體種類多元與同儕政治偏好類似皆與參與太陽花學運有相關，但在支持與否就只有同儕政治偏好類似有相關，媒體雖然提供了政治資訊，可能會使大學生認知到太陽花學運一事並且增加其參與度，但並不會影響其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這也符合前述的「最小影響模型」，大學生獲取政治資訊與其對該事件的態度沒有太大的影響。

在性別部分，男女在支持太陽花學運與否沒有顯著的差異，但在參加上有顯著相關，男生較容易參加抗議事件，闡明了女性確實可能因為抗議現場的環境因素而打退堂鼓。

整體而言，支持泛綠、社會階層較高、距離較近、觀看媒體種類較多、與同儕政治態度相似的男性更可能參與太陽花學運；而不支持泛藍、支持泛綠、認同自己是台灣人、與同儕政治態度相似的人比較可能支持太陽花學運。

二、參與與支持太陽花學運與否對政黨偏好的影響

我們進一步檢視參與與支持太陽花學運是否與其往後的政黨偏好會有關聯，從支持到進一步參與之間的落差到底在現代社會有多大？是個值得探討的問題，現今社會網路無遠弗屆，遠在香港、法國等抗議事件皆會透過網路傳進台灣的民眾眼中，比起1960年代反越戰只靠電視、報紙、廣播等傳播媒體有著更快速、便利的資訊，是否會造成參與與支持與否之間的落差縮小？以下接著討論。

表一 參加與支持太陽花學運之二元勝算對數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是否參與太陽花學運 | | 是否支持太陽花學運 | |
| (1=參加、0=沒有參加) | | (1=支持、0=不支持) | |
| 係數 | 標準誤 | 係數 | 標準誤 |
| 支持泛藍 | -0.19625 | 0.17204 | -0.69704\*\*\* | 0.15677 |
| 支持泛綠 | 0.44875\* | 0.19247 | 1.08728\*\*\* | 0.26390 |
| 台灣/中國認同  (中國人與都是=0) | 0.23067 | 0.18746 | 0.36284\* | 0.16960 |
| 社會階層(1-5) | 0.31237\*\* | 0.10765 | 0.09059 | 0.10254 |
| 學校位置是否位於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新北市=1) | 1.16019\*\*\* | 0.15501 | 0.08008 | 0.16132 |
| 媒體(0-5) | 0.14485\* | 0.06586 | 0.01628 | 0.06166 |
| 同儕(1-4) | 0.45480\*\*\* | 0.10203 | 0.27560\*\* | 0.09646 |
| 男性  (女性=0) | 0.45852 \*\* | 0.14781 | -0.01568 | 0.41408 |
| 常數 | -4.22944 \*\*\* | 0.48654 | -0.17242 | 0.41408 |

樣本數：1094

P<0.001 ‘\*\*\*’；P<0.01 ‘\*\*’； P<0.05 ‘\*’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1，2015)

表二為藍綠政黨偏好之二元勝算位數分析表，左側為大四學生支持泛藍與否的模型，右邊是大四學生支持泛綠的分析，需要說明的是，因筆者將兩者分開探討，為避免分析泛藍或泛綠時另一數值的干擾而產生過於顯著相關的情形發生，故分別在分析支持泛藍或泛綠時排除另一個政黨偏好，只留下中立這項變數做比較。

首先，參加太陽花與否與政黨偏好泛藍的大學生沒有顯著相關，但卻與政黨偏好泛綠的學生有顯著相關，說明太陽花的參與者較未參加者更可能支持泛綠，而支持太陽花學運者在泛藍泛綠兩個模型皆有顯著相關，整體而言對太陽花學運持反對意見的人較支持泛藍，而對太陽花學運持正面意見的較可能支持泛綠，證明了太陽花學運的確會影響其參與者，但僅限於增加對泛綠偏好的可能，但支不支持則比較全面，與泛藍泛綠的政黨偏好皆有相關且為單向的關係。

另外雖然大一的政黨偏好的確會影響大四時的政黨偏好，惟因本模型在兩個分析時分別替除了另一邊的政黨偏好，導致會對兩個時段的政黨偏好估計有放大的效果，這部分有待後續處理。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相較於支持太陽花與參加與否兩個變數，其他變數除了媒體與性別仍與支持泛藍有顯著相關，其他皆無顯著差異。

整體而言，不支持太陽花學運、觀看媒體種類較多、女性較可能支持泛藍；參加或是支持太陽花學運的大學生則較可能支持泛綠。

表二 藍綠政黨偏好之二元勝算對數分析

|  |  |  |  |  |
| --- | --- | --- | --- | --- |
|  | 大四政黨偏好「泛藍」 | | 大四政黨偏好「泛綠」 | |
| (1=支持、0=沒有偏好) | | (1=支持、0=沒有偏好) | |
| 係數 | 標準誤 | 係數 | 標準誤 |
| 參加太陽花與否(參加1) | -0.1914 | 0.2475 | 0.41923\* | 0.20064 |
| 支持太陽花與否(支持=1) | -0.6455\*\* | 0.2081 | 1.24076\*\*\* | 0.26932 |
| 大一支持泛藍(支持=1) | 2.5863\*\*\* | 0.2496 | -0.23755 | 0.22142 |
| 大一支持泛綠(支持=1) | -0.5844 | 0.7624 | 2.40877\*\*\* | 0.21729 |
| 台灣/中國認同  (中國人與都是=0) | -0.2014 | 0.2536 | 0.32561 | 0.31535 |
| 社會階層(1-5) | 0.2481 | 0.1431 | 0.12992 | 0.12865 |
| 學校位置是否位於台北市、新北市(台北市、新北市=1) | 0.3294 | 0.2250 | -0.06233 | 0.20906 |
| 媒體(0-5) | 0.2670\*\* | 0.0880 | 0.05482 | 0.07828 |
| 同儕(1-4) | -0.1713 | 0.1361 | -0.04291 | 0.11821 |
| 男性  (女性=0) | -0.4177\* | 0.2019 | 0.12191 | 0.17891 |
| 常數 | -3.0693\*\*\* | 0.6269 | -3.14398\*\*\* | 0.59848 |

泛藍模型樣本數：737；泛綠模型樣本數：812

P<0.001 ‘\*\*\*’；P<0.01 ‘\*\*’； P<0.05 ‘\*’

資料來源：陳陸輝(2011，2015)

伍、結論與展望

被稱為台灣社會近年來最重大的抗議事件，太陽花學運對於台灣的影響十分重大，其中又有一半的參與者為大學生(陳婉琪、黃樹仁，2015)，可見其對大學生的影響尤其重要。整體而言，大學生太陽花學運之前就已經呈現了不同的樣貌，參與者與非參與者已經在先前的政治社會化過程中發展出不太一樣的政治態度，也握有不同的資源，導致在實際參與時已經有些不同，爾後在事件結束後，其影響並未消逝，而是進一步影響了大學生的政黨偏好，表示太陽花學運的確會對大學生的政黨偏好產生影響。

本研究有些發現與此前關於太陽花學運的研究有些相似之處，譬如陳光輝(2018)研究政治相關科系大學生時即發現女性在參與抗議事件意願較男性低、擁有較多資源與較需付出較低成本的大學生更可能參與抗議活動以及太陽花學運參加者較易支持泛綠政黨等。不過本研究也進一步證明了雖然一般大學生與政治相關科系大學生在學習歷程上的不同與對政治資訊的吸收來源不同會產生差異(陳光輝，2018)，但在參加抗議事件與受到重大事件的政治社會化影響還是有相同之處。雖然如此，政治相關科系與一般大學生對於政治資訊的接受仍然有落差，但這樣的落差是否顯著，亦或是對哪方面的影響會有比較明顯的差異，有待未來研究發展。

關於抗議事件對於參與者的影響在西方多有研究，台灣社會隨著民主化歷程的更迭，政治抗議事件卻未曾消弭，這類型的重大事件亦會改變一個人的政治態度，且在往後的每個生命階段造成程度不同的改變，影響甚大，值得持續注意。

陸、參考資料

陳陸輝(2000)。台灣選民政黨認同的持續與變遷。選舉研究，3(3)，109 – 141。

游清鑫(2002)。台灣民眾的政黨偏好：方向與強度的探討。中國地方自治 ， 55(10)， 4

– 20。

游清鑫（2004）。分裂投票解釋觀點與台灣選舉之應用：以2002年高雄市長與市議員

選舉 為例。台灣政治學刊。8(1)，47-98。

楊婉瑩(Wan-Ying Yang) 、 劉嘉薇(Jie-Wei Liu)。探討統獨態度的性別差異：和平戰爭與

發展利益的觀點。選舉研究 16(1)，37 - 66

陳光輝(2018)。政治學相關科系大學生參與太陽花學運的追蹤分析。臺灣民主季刊 。

15(2) ，51 - 99

劉嘉薇(Jia-Wei Liu);黃紀(Chi Huang)(2012)。父母政黨偏好組合對大學生政黨偏好之影響-定群追蹤之研究。臺灣民主季刊。9(3)，37-84。

陳婉琪、黃樹仁(2015)。立法院外的春吶—太陽花運動靜坐者之人口及參與圖象。台灣

社會學。30，141-79。

蔡佳泓、陳陸輝(2015)。「中國因素」或是「公民不服從」?從定群追蹤樣本探討太陽

花學運之民意。人文及社會科學集刊。27(4)，573-603。

Almond, Gabriel A. and Sidney Verba. (1963) . The Civic Culture. Princeton, New Jerse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erelson, Bernard , Paul Lazarsfeld, and William McPhee. (1954). Voting.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ampbell, Angus, Philip E. Converse, Warren E. Miller, and Donald E. Stokes . (1960). The

American Voter.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Chatard, Armand and Leila Selimbegovic (2007). “The Impact of Higher Education on

Egalitarian Attitudes and Values: Contextual and Cultural Determinants.” Social and Personality Psychology Compass, Vol. 1:541-56.

Dinas, E. (2013). Opening “Openness to Change”: Political Events and the Increased

Sensitivity of Young Adults.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66(4), 868–882.

David Riesman, Reuel Denny, Nathan Glazer. (1950). The Lonely Crowd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Hyman, H. H. (195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A Study in Psychology of Political Behavior.

New York: The Free Press.

Herbert, H. Hyman. (1969).”Mass Communication a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The Role of

Patterns of Communications,” in Lucien Pye (ed.), Communications and Political Development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 Press), pp. 143

Hastie, Brianne. (2007). “Higher Education and Sociopolitical Orientation: The Role of Social

Influence in the Liberalization of Students.” European Journal of Psychology of Education,Vol. 22, No. 3:259-74.

Highton, Benjamin. 2009. “Revis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ducational Attainment and Political Sophistication.” Journal of Politics Vol.71, pp.892-911.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71) . “The Division of Political Labor Between

Mothers and Father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 65, No. 1: 69-82.

Jennings, M. Kent and Richard G. Niemi. (1982) . Generations and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Jennings, M. (1987). Residues of a Movement: The Aging of the American Protest Generation.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81(2), pp. 367-382.

Klandermans, Bert. (1984). “Mobilization and Participation: Social-Psychological Expansisons of

Resource Mobilization Theory.”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 49, No. 5:583-600.

McAdam, Doug. (1986). “Recruitment to High-Risk Activism: The Case of Freedom

Summer.”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 92, No. 1:64-90.

McAdam, Doug (1988). Freedom Summer.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Niemi, Richard G., and Herbert F. Weisberg (1993). “How Meaningful is Party Identification?”

In Richard G. Niemi and Herbert F. Weisberg (eds.), Classics in Voting Behavior (pp. 210-23). Washington, DC: Congressional Quarterly Inc.

Neundnorf, Anja, and Richard G. Niemi. (2014) “Beyond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New

Approaches to Age, Period, Chorts Analysis,” Electoral Studies, 33, 1-6.

Paul, Lazarsfeld, Bernard Berelson, and Hazel Gaudet. (1948). The People’s Choice.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Pierce, Roy and Philip E. Converse. (1989). “Attitudinal Roots of Popula Protest: the French

Upheaval of May 1968.”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Public Opinion, Vol. 1, No. 3:221-41.

Richard E. Dawson, Kenneth Prewitt. (1969). Political Socialization . Boston: Little, Brown and

Company.

Raviv, A. , Sadeh, A. , Raviv, A. , Silberstein, O. and Diver, O. (2000), Young Israelis' Reactions

to National Trauma: The Rabin Assassination andTerror Attacks. Political Psychology, 21: 299-322.

Robert S. Erikson, Kent L. Tedin. (2015). American Public Opinion. New York: Routledge

Tedin, Kent L. (1980). “Assessing Peer and Parent Influence on Adolescent Political

Attitudes.”

American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24, No. 1:136-54.

Verba, Sidney, Kay Lehman Schlozman, and Henry E. Brady. (1995).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Weisberg, Herbert F. (1980), “A Multidimensional Conceptualization of Party Identification,

Political Behavior ”, Vol.2, No.1, pp.33-60